

10.12
34

南长文史资料

第三辑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专辑

89

政协无锡市南长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1. 曙光初照无锡城 王传麟 (1)
2. 无锡解放初期丝厂复工经过 沈鹤风口述、吴仁修整理 (3)
3. 同江南进军掠记
——我在无锡解放前后的片断经历 陈定奎口述、徐 颖整理 (8)
4. 在地下斗争中的培南小学 邱宝瑞 (12)
5. 迎接黎明 唐 维 (17)
6. 解放初期参加农村工作团二、三事 吴仁修 (22)
7. 我区居民委员会的建立发展及其功能 谷云天 (31)
8. 脱政思想及群众关系 华洪山 (35)
9. 南长区初期司法建设 何重耳 (38)
10. 清海运动的巨大成绩 谷云成 (41)
11. 南区建立的两个联合劳工保健站 鲍洪发 (43)
12. 南长街的今昔 培光云 (45)
13. 好好商店 吴伟勋 (46)
14. 记解放前夕工商自卫团在我区的两个大队 吴 决、莫耀宗 (49)

曙光初照无锡城

——无锡解放时给我的印象

王传麟

1949年4月23日深夜，大约在11点钟光景，在无锡上空隐约传来了一声声炮响，这标志着无锡的解放。在未听到炮声之前，收音机里播放着“打得响当当，打得响当当，解放军，功劳高，功劳高”等捷报频传的歌曲，真是激动人心。

炮声之后，并未听见枪声，解放之夜同平时一样宁静。这是什么原因呢？事情并不奇怪，人们在23日下午早就看到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匆忙逃窜的狼狈样。当时的社会秩序是由民间组织的工商自卫团在维持。后来听说，旧商会还派出代表去苏北迎接解放军，要求对无锡实行和平解放。这对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长期压迫下的无锡人民的心愿是十分符合的。代表中间，有一位是旧商会会长钱孙卿先生的儿子钱钟汉。解放后，钱孙卿担任过苏南行署副主任；钱钟汉担任过无锡市副市长。这是人民没有忘记他们父子为无锡解放效过劳的功绩。

4月24日清晨，曙光初照无锡城，象征着解放了的无锡已获得新生。社会秩序井然。当时，我是无锡机械行业中的一家中小型私营铁工厂的负责人。自从听到了这声炮响，我心里一直考虑着自己工厂的安全。所以在曙光初照的时刻，我就从家里出来，经过光复门、太平巷、吉祥桥到胜利门，观察社会情况。走了这么多路，却没有看见解放军。只是走到了胜利门，才看到有几个解放军在站岗。胜利门上张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告。我就详细阅读了布告的内容，原来就是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安民告示。特别是把“不拿群

众一针一线”作为“三大纪律”之一的条文，使我很受感动。一针一线，本属小事，作为纪律，就成大事。这说明解放军的纪律是严明的，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这就使我增强了安全感，一鼓劲儿地跑到厂里。

住在厂里的同志激动地对我说，昨日夜里，解放军在马路上经过，一点也没有惊动老百姓。我厂的学徒工张继林今天早晨已经到工艺路县政府门口站岗去了。在回家途中，我特地到工艺路县政府门前去看看，果然看见张继林身穿草绿色军装，手持钢枪，以一个青年战士的英姿，正在值勤。他看见了我对我笑笑，我也高兴地笑了。原来张继林是一位革命烈士的独子，他的亲戚介绍他到我厂来当学徒时，曾暗向我说明过这一情况。他现在参加了解放军，这真是人民的子弟兵。

回到家里，出乎意料，解放军部分战士借驻到我们家里来了。在三开间门面的一个大厅里，地上铺满了稻草，睡满了人。到下午三时，部队要出发，临行之前，他们把地上的稻草收集起来，一捆一捆地扎好，哪里借来的就还到哪里去。并把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的房东许竟凌老先生看到了此情此景，很有感触地对我说：“无锡沦陷时，我这宅房子的大门上还留有日军刺刀的痕迹，大厅里红木台子上的刀疤，是日军的指挥刀所砍。现在无锡解放了，解放军借驻在这个大厅里，临走时打扫得一干二净，还要表示谢意。相比之下，真是泾渭分明。”

同年夏天，东新路派出所进行民警集中学习，又借用了许家的大厅。由于时间较长，大家相处比较熟悉。一天，我家买西瓜吃，我妻子拿了两只西瓜送给学习班的同志们吃。结果，西瓜他们吃了，但按市作价，把瓜钱算还给我们。学习班结束后，他们把大厅里用的几只照明电灯，照价算给电费。这一举一动，不正是他们以实际行动，遵

守站在胜利门上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表现吗？

某一天，在雅育小学里召开了一次民主选举居民代表的会议，我也作为候选人之一，选举的方法非常简单：候选人背靠台子坐着，台子上放着一只空碗。选举人每人手中拿着几粒红豆，如同意选举某人，就在该候选人背后的空碗内投入一粒，不同意的就不投。选举结束后，清点该候选人碗中所投红豆的多少，决定是否当选。这样的民主选举，可能就是现行的无记名投票选举方式的由来吧。

以上所述的一些点滴事例，在无锡解放初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心里热爱解放军，拥护人民政府。在自己的头脑中，总感觉到老解放区人民所唱的歌词——“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两句话是多么亲切，多么真挚。这种情感直到现在还回荡在我心中。

无锡解放初期的丝厂复工经过

沈鹤凤口述 美仁修整理

1949年3月8日我们大丰县万盈区抽调8名干部和大桥区抽调的8名干部一起，出发到草堰集中，组成一套班子，准备到苏南去接管一个区。整个东台、大丰各抽调120多人接管一个县。3月9日赶到泰州，住在老鱼行，第二天就遭到敌机轰炸，是特务发的情报，幸无伤害，更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我们苏中一分区、二分区共集中了800多名干部在泰州学习了一个多月。全体干部分成两个大队，一个是行政大队，准备接管政府部门的工作；一个是职工大队，主要是抓工厂企业的职工工作。我就分在职工大队，负责带队的是大丰县

委书记王家扬同志。（后任苏南总工会主席）胡平华、沈且华、陈勇等同志都在这个大队。

4月23日随大军渡江，26日从北固口、江阴巷进无锡城，住在夏兴路无锡县监狱（即现在述华工厂），卫生条件差，臭虫叮得使人睡不着觉，以后就搬到南仓门缫丝业同业公会，并即与地下党员刘阿大同志一起负责全市缫丝厂的复工生产和筹组缫丝业工会等工作。经市委批准，组成缫丝工作组党组，由张月珍任书记，我任副书记，缫工一校的地下党员有二人，也参加了工作组。

无锡市是缫丝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大小丝厂六十多家，职工有一万多人。除了鼎昌、嘉泰、永泰、纯昌、瑞纶、美新、华昌、五丰……等丝厂规模比较大，其余的都是小厂，二、三十部车，甚至一、二十部车都有。不仅进厂小，而且设备亦陈旧，都是坐缫车，各个丝厂都有年仅七、八岁的童工小妹妹，工人的工作时间有长达十二、三小时的。当时有首氏谣：“头岁罗（汽笛）叫，二岁岁晚，三岁岁进监狱”；“鸟叫做到鬼叫，该也吃不饱”。解放前丝厂工人的生活是极为悲惨的。无锡解放了，工人当家作了主人，但是丝厂仍然停工，万余职工生活无着。为安定社会秩序，解决缫丝业工困难，摆在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复工。

当时丝厂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对我们党的工商政策不了解，对形势的认识还不清，对开工生产心存观望或顾虑重重。除了一些小厂，大厂都在停工中。但是，纺织系统的纱厂、布厂，解放后基本没有停工。“大烟囱冒烟，小烟囱也冒烟”。丝厂职工及家属几万双眼睛都盯着我们，看政府能不能动员资本家开工生产。对我们这些过去从未搞过城市工作的干部来说，可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苏南行署及时作出了部署：一方面通知无锡市丝厂业同业公会组织春蚕收购工作，以保障蚕农利益，尽快恢复农村经济；一方面又做丝厂资本家的工作，阐明党在现阶段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当时华昌丝厂有一部分产权是属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应予接管。人民政府派李汉光同志任公方厂长，胡日清同志为人事秘书，做好私方厂长丁步云先生的工作。丁先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筹集资金，整修设备，在1949年5月率先复工复产。当时，丝厂工人的日工资平均只有四升米钱，童工只有一升多米；全厂400多名工人，开足120部坐缫车，生产恢复了，对全市的影响很大。我们缫丝工作组的同志继续做好职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筹建工会组织。以改善和关心职工的生产、生活问题，一些重要的问题，都是事先做好工作，通过劳资协商会议来解决。

我记得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要动员华昌丝厂的工人减工资一事。因解放初生产出来的白厂丝，受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政策，外销不出去，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自然大打折扣。华昌丝厂虽然开工，其他丝厂的私方还在观望等待，看政府的态度。有关领导部门决定恢复生产、共渡难关，要把缫丝工人的月工资由四升降到三升二合八，每天要少拿七合二米钱。职工闻讯，情绪激动，群情哗然。而其时派到华昌丝厂去工作的个别同志，由于不注意工作方法，比较简单化，态度不生硬，少数工人思想不通，形成僵局。我们深知如果这一个问题处理得不好会酿成意外，必须十分慎重。

我们工作组首先分析了形势。如果华昌的职工工资暂时降不下来，其他丝厂资本家的复工更有困难，应该妥善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工作组内部统一了思想认识，有关同志诚恳地向华昌职工作了深刻的

检讨，取得了工人的谅解和信任。由于道理通了，由四升降到三升二合八也就基本解决了，工人照常上班生产。在华昌的影响下，中丝二厂（即嘉泰丝厂）亦在厂长许汝良的支持下于49年9月复工复产，开了30部立缫车，340部坐缫车。50年6月永泰丝厂也开工生产。其他各家丝厂也都先后开工，应当说华昌丝厂是起了带头作用的。职工工资减了两个月后，就加上去了。

与此同时，苏南丝绸公司成立了，统一收茧。由各丝厂为公司代缫加工，收一定的代缫加工费，使资本家有利可图。1950年丝厂职工的工资亦按国家规定的折实单位计算发给，生活相对来讲是安定了。

在中共无锡市委的领导下，我们缫丝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在工厂做好建党、建团、建立工会的工作。除张月珍和我以外，工作组成员还有刘阿大、王咏梅、顾复昌、李惠君等同志。我们不仅在丝厂内做工作，还深入到职工家属和居民中去做群众工作。我负责联系的有大小几十家丝厂，不分白天黑夜，奔走于南下街、龙船浜、夹城里、炒米浜、灰场浜、南河浜、华新里等大街小巷。这些地方，都是丝厂职工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丝厂女工占30%。她们的父兄、丈夫大多数是从事苦力劳动，有的拉人力车，有的做清洁工，多数没有文化。丝厂职工及他们的家属，全市就有近三万人，是个不小的数字呵！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是苦大仇深，相信共产党帮助工人翻身作主人，因而对人民政府是有感情的。但是其中也可能有极少数认识不清的人。有一次我到职工家里去访问，就被失业在家里的职工所包围，有个人恶言质问道：“都是你们共产党来了，才使工人失业在家里。”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围观的人很多，我毫不示弱，理直气壮地摆事实讲道理，要大家比一比人民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哪个对群众关心，旁边

斤的人也觉得有道理，就把起哄的人拉走了。后来，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积极分子队伍的日益壮大，我即使一个人出去工作，也无所顾虑，工作进行得很好。

当时，工人多数是住的草棚子，名叫“滚地龙”。就跟农村里普瓜田搭的高棚子那样；还有的职工就住在船上，因为家属是船民。这哪里谈一个“家”呀！人不好站直了过去，只能弯着腰走进去。没有窗户，黑洞洞的；晚上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河水。若是遇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里头落小雨，把可以盛水的盆、桶、缸都派上用场，生活非常艰苦。而丝厂的民主改革还没有进行，女工还要受到诸如“抄身制”等人身侮辱；而身为盆工的小妹妹，则遭遇更惨。华昌丝厂是国营企业，在民主改革中率先废除了侮辱工人人格的抄身制，并严格禁止管理制度上的打骂现象，工人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生产积极性也高了，按照丝制公司的要求，什么庄口的茧子，要缫什么等级的丝，缫折多少，基本上都能达到标准。

回顾解放初期的丝厂工作，深切感到作为党的工作者，首先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职工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小局要服从大局，再大的压力要顶得住。要保护群众利益，就必须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入手，搞好丝厂的复工工作。

其次，要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要在斗争中培养积极分子。当时，丝厂的地下党组织力量还是比较单薄的，我们采取滚雪球的办法，从工人中发展党员。陆续在几家大厂成立了支部，相继建立了工会，壮大了积极分子队伍。

第三，要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工作中不能包办代替，在华昌丝厂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很好地教育了工作组全体干部，

由于思想观念转变了，开展工作也就顺利了。

第四，必须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政策。解放初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是发展生产，保障生活的正确方向。工作中还必须监督资本家服从党的政策，在加工订货中不得偷工减料、偷税漏税；并且在具体的困难中，亦通过同业公会、劳资协商会来研究解决，使资本家有合法的利润可得。

在解放四十周年的庆祝日子里，回顾解放初期我在丝厂工作的一段经历，对自己亦是很好的一次教育。

向江南进军 摘记

——我在无锡解放前后的片段经历

陈定奎口述 钦 琦整理

一、学习

1948年的冬天，我在东台县安丰区当区委书记时，才33岁。当时为了打过大江南去，解放大江南，要配备一大批革命干部南下，发动了普遍报名，让组织上挑选，结果我被选上了，于是告别了父母妻子，集中到县里。接着县里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进行会餐，然后在热烈的锣鼓声、鞭炮声中夹道欢送，一直送到泰州。在泰州，我们住在老鱼行。一天，国民党的三架飞机来轰炸，胆小的连忙往桌子底下躲，我笑着说：“真的炸到头上，桌子顶什么用！”幸好一个都没有伤着。不久，集中到泰州南面的高家庄学习，由于怕死、恋家等种种原因，队伍里有人开小差，于是组织上把学习抓得更紧了，整天

的学习、讨论，稳定情绪，增强革命信心。我表了态：“死也要死到江南去！”

在高家庄临行之前谢克东同志给我们做了一次报告，介绍了无锡情况。每人还发到一本小册子，那是党在无锡的地下组织提供的非常详细的调查报告。就这样，我们做好了解放无锡、接管无锡的准备工作。

二、渡江

渡江走在4月23日晚上进行的。国民党军队用飞机炸和大炮轰来“欢迎”我们，江面上被探照灯和照明弹照得通亮。

我乘坐的一艘机轮船是比较大的，同船的有近二百人，领导同志有管文蔚、包厚昌、徐静渔等。大家都带着小刀和棉花，以防船身被击中时凿洞堵漏之用。船上还宣布了纪律：任何情况下都不准随意乱动。因为船虽然比较大，负载量恐怕已经超过了。

由于船的体积大，作为被敌人的炮火攻击的目标也明显，但大家镇定沉着，勇往直前，在猛烈的枪林弹雨中挺进。因为后退是不行的，停顿等于挨打，只有前进才是生路，才能取得胜利。

轮船驶近南岸时，一声令下，大家都往寒冷的江水中跳，水有齐胸高，踩着水艰难地前进，终于登上了江南的土地。

三、抵锡

1949年4月23日的深夜，我们从江阴开始出发，在锡澄公路上急行军，直达梁花庄，当晚住在西门内的原模范监狱里面。

24日，在城中公园和无锡地下党的同志们会师。由于工作需要，地下党同志们的穿着都比较入时，有的女同志穿的是漂亮的旗袍和高跟皮鞋，我们有些同志还穿不大慎，在低声嘀咕，我瞪了他们一眼，

也不知说什么好。突然，我看到一位熟人，跑过去喊他老孙，他也叫我老陈同志，我们久久的握着手，思绪中追溯着四年前的情景：

1945年，我在苏北如皋县党校学习时，和老孙是同班同学，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感情很好。学习结束后，大家各奔自己的工作岗位，只知道他被分配到无锡某某中学当教师，那是他的公开身份，实际上是搞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国民党在苏北发动反攻，我跟着队伍骑自行车北撤了。从此相互间音讯全无，想不到今天会在无锡重逢。

四、驻 厂

过江后我的第一站就分配在南门外的益民纱厂，当工厂工作组的组长。工作组的四、五个人都是苏北来的，一开始和厂里的工人无法接近。关键是语言不通，讲话听不懂，于是我灵机一动，天天跑车间，访问工人，目的是寻找工人中的苏北人。不久果然找到好几个，我教他们唱苏北小调，跳秧歌舞，跟他们打成一片，于是我就请他们当“翻译”。渐渐地认识了不少工人。他们都向我们靠拢，无话不谈了。

益民纱厂的经理叫张品泉，为人很刻薄，据说他过去当过江阴的警察局长、县长。又有人反映说，他在厂里藏有枪支弹药……。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我在全厂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群众发动起来了，张某的种种劣迹、罪行都揭露了出来。就在这时，我接到调令，又走向新的岗位。

五、镇 反

1949年5月，我被派到清名桥派出所当所长。

那时的派出所权限可大啦，因为刚解放时由旧的镇公所改名的镇人民政府撤销了，派出所实际上担负着政府好多部门的工作，诸如治

安、交通、民政、救济、户籍等等，工作既繁重又紧张。但刚成立的派出所连一间房子也没有，我到处找房子，最后在大有弄8号找到一家邵姓资本家的住宅，当时他本人跑掉了，只留一个老大看门，我们十几个人便定居下来。

解放初期的情况比较复杂，清名桥一带的不安宁因素主要是：

水道上，水火帮划着小船进行抢劫；

陆路上，华新丝厂以南也不好走，盗匪抢劫过路客商后，把人绑在树上，嘴里堵上东西，防你喊叫报信；

大窑路一带，有匪特躲在窑洞里，晚上出来抢东西、杀干部；

一貫道等反动道会门与匪特串通一气，为非作歹；

张元庵里有特务盘踞在那里……

因此，我们虽然都有枪，白天外出也要二人同行，晚上就更多。

我们紧密依靠群众，狠狠打击匪特盗贼的猖獗活动：

1950年冬，一名群众来报告说：“太有弄里某某人家来了个陌生人，有枪，据说要端掉派出所”。当晚我们就采取行动，把人抓起来，还缴到一支白朗宁手枪。

我们的侦察队侦察到大窑路的匪特有杀干部的行动计划，便果断地先走一步，粉碎了这一阴谋。

南门外有个外号叫“三只头”的黄培俊，平时作恶多端，放高利贷，光杆子起家，造了楼房，48年国民党户口检查时，他骑了摩托车专抓共产党。镇反时抓了起来，还坚持反动立场，说：“有我无你，有你无我”。可见歹徒和广大人民是势不两立的，只有彻底铲除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1953年第一次普选时，我又调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了。

在地下斗争中的培南小学

邱宝瑞

培南小学原名谷余小学，始创于1928年，以南水仙庙为校舍。1930年春，里人鉴于南门外中学很少，学生升学困难，乃扩延为初级中学，更名为培南（谷余作为中学的附属小学）。1931年10月江苏省教育厅批准立案。学生第一届毕业于1933年。前无锡市劳动局副局长胡感荪、市政协副主席史明东和我都是这届毕业生。同年秋由于经费困难，中学停办，小学仍以谷余旧名续办。由臧鹤球任校长。1936年我曾在谷余任教。抗战爆发，无锡沦陷，学校停办。

1941年，我由组织委派，从上海回到无锡搞地下情报工作，受中央特科情报站领导。根据领导指示，需要有一个稍有地位的职业作掩护，以利开展工作。可利用我的父亲邱子善（原系培南中学的校长，人际交往很广，地方情况熟悉）的关系，恢复培南中学，取得立足点。我各方奔走，重组校董会，聘任万知名人士为校董，筹集资金，修缮校舍，聘请教师，我自任校长，办起了初中一年级一个班及四个班级的完全小学。学生二百余人。我以中学校长的身份，印了名片，外出活动，搜集情报。曾于新生路一寺务公馆（日伪特务机关）搞到日军清乡部署的情报；于一个伪军团长处得到狂锡、淫、属伪军兵力的情报；于县米业公会摸集到日军米购军粮的情报。这些情报，密写后交给当时担任秘密交通的方知达同志（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虽由于中学校长有一定的地位，未遭敌人注目，但亦曾于日军到校检查户口时遭他的磁击，遂邻里群众证明是好人，始免遇难。

1942年下半年，因几位与我党有秘密联系的日本同志被捕（即

日军所谓中共谋叛集团案），牵涉到上海、南京、北平的我党地下组织，南京情报站亦遭破坏，组织与我失去了联系。

失去联系后，我仍坚持办学，作长期打算，以待时机。学校因经济困难，中学停办，保留培南小学。1943年冬，我与茅山根据地汤云才同志取得联系后，即协助费润祥为根据地采购药品和通讯器材，并介绍有志之士去茅山参加革命。南京站被破坏时，在南京被捕的陈三百同志被判刑押解到无锡监狱。我通过种种关系，对陈在生活上予以接济，在政治上给传递解放区消息，把解放区的油印小报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书刊，秘密送进监狱，供难友学习，以增加他们的信心和斗志。並指导他们与狱方斗争。这些工作，都是先借培南小学校长的身份秘密进行的。

要利用培南，必须办好培南，才能取得群众信赖，在尽量把书教好的同时，注意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在不暴露掩护革命的前提下，用讲历史故事的形式，启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播下革命的种子，将来成为国家有用之材。为此，请在狱中的陈三百、况天祺，为学校谱写一首校歌：“泰山之麓，运河之滨，有我们的第二家庭，德、智、体、群，教育着年轻的国民。努力学习，今天的责任；服务社会，明天的使命。小朋友！前进！前进！我们是新中国的少年兵！”这支歌曲调高昂，词意含蓄，激发着学生好学上进，精神振奋的作用。1944年秋，陈三百、李遂等同志，先后相继“假释出狱”，我即安排他们在学校任教，暂时安身。以后，介绍他们去茅山，重新参加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适应形势，改组了校董会，聘请了国民党参政会参议长李惕平为校董会主席，以提高学校的地位。

1943年春，华中一地委派周克、周晓华等同志来锡开辟工作。当时无锡特分机关林立，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他们人地生疏，无法立足。周克与我取得联系后，到学校观察环境，认为这里地理条件与人际关系都较好，适合作为一个秘密工作的据点。不久，周克、周晓华即来校担任教师作为掩护，开展工作，成立了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不少同志分批从外地调到无锡工作，都安排在学校担任教师，先后有诸敬、钱星海、任竹影、王靖、高山、汪津、庄静波等同志。第一任工委书记周克、副书记周晓华。周克调离后，又调来诸敬同志任书记，诸敬浙江后，又调来高山同志任书记，一直把培南小学作为工委机关所在地，许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直至解放。他们运筹帷幄，领导全县的地下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工厂、学校、青年、妇女等支书。并开展策反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同时，因为在学校都担任职务，必须把书教好，教一行，算一行，以取得教师们的信任和学生的爱戴，更有利于掩护。他们生活艰苦，月薪不足一担米，外出工作，全靠两条腿跑路，连乘车钱也没有。晓华、诸敬经常从城南跑到城北，又从城北返回城南。有时，为了避人耳目，深夜绕过回校，肚子却走空空的。工作那么繁重，生活那么艰苦，倘若没有安全，什么都办不成。一个小学，要安排那么多外地来的同志住读，又要住宿在学校，困难是很多的。首先申报户口是突出的困难。当时，国民党控制很严，为防止“窝匪藏匿”，报一个户口需得左邻右舍“联保联坐”，而且警察局第三分局就设在本镇，镇公所近在咫尺，加之地方上还有一股势力，以水仙庙的主人自居，对学校虎视眈眈，寻衅滋事。处在这样险恶环境之下，稍一不慎，不仅危及我的全家，主要是会牵涉到无锡大局，还会影响到苏州等地的地下党。经组织研究，利用我世居南门。

父亲在当地稍有地位、人际关系熟的有利条件，与保甲长搞好关系。更重要的是“靠山”比较硬，校董会主席是县参议会的参议长，开学典礼时，请来学校讲话，以壮声势。同时与地方士绅唐文铭、黄卓甫等交朋友，取得他们对学校的支持，以巩固学校的地位。我还以教师代表的名义，竞选县参议员，取得候补参议员的头衔，从而开展广泛的社会活动，使人看来这个学校是有来头的，办起事来，容易应付，蒙蔽了敌人的耳目。

另外，学校是利用南水仙庙为校舍，国民党军队常企图进驻学校，这将造成很大的危险。我们想方设法找到国民党政府有关禁止学校驻兵的文件，拍成照片，悬挂在校门之旁。我们还请校董出面，辗转请国民党主席林森题了“浩气长存”的匾额。这两件“法宝”，居然起了作用，国民党军队就不再来找麻烦了。

做好学校外部工作，加深了保护色。学校内部团结教师的工作也是一道防线。教导主任惠沛如，教师邓济美，都是教龄长，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为人朴实，在教师中有一定的威信。晓华、任竹影经常与他们家常，谈身世，建立友谊。他们虽然不知道同志们的身份，却成了知心朋友。同志们外出工作，所缺课程，惠、邓都乐于代课。由于我们教师工作做得好，学校风气好，教育质量较高。远在五、六里路外的学生，宁可带着中饭；淌河的学生，不惜渡河，纷纷来校就读。学生从二百人发展到四百人，学校从四个班发展到六个班，还增办幼儿园两个班。从庙内几个厅外，戏台、看楼都成了教室。荒芜的后园，经师生一起劳动，整修成有假山、池塘、四季花不绝的校园。学校有了一定的规模，在南门一带有相当的威望。学校威望高了，地位更巩固，更有利于我们地下革命工作。